

威權統合主義下的雙面性社會團體——以1950年代「台北市報業公會」為例

The Bifrontal Social Groups under Authoritarian Corporatism:
Taipei Newspapers Association in 1950's

夏士芬 Shia, Shih-Fen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摘要

本文旨在探究威權統合主義下社會團體的雙面性，以1950（民國40）年代的「台北市報業公會」為例，闡述報業公會一方面落實統合主義的精神，扮演類政府組織的角色，橫向聯繫、服務報業，特別是協力政府從事新聞外交活動，結合同為反共陣營國家的新聞界，並參與國際性新聞組織，代表自由中國發聲；另一方面，又秉持自由主義的精神，實踐一社會團體所應具備公共領域的功能，與政府周旋以爭取報業的共同利益，雖然沒有成功，但已寫下一頁歷史的篇章。因為，進入1960年代後，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走向高峰，新聞界的統合工作也漸地完成，新聞團體已無法再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提出請願或異議。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dualit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 corporatism. Taking the “Taipei Newspaper Association” in the 1950s as an example, how to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playing the role of a quasi-state institution, and how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public sphere, figh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for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newspaper industry.

關 鍵 字 | 臺灣新聞史、威權統合主義、類政府組織、公共領域、報業公會

Keywords | history of Taiwan Press, Authoritarian Corporatism, para-governmental institution, public sphere, Taipei Newspapers Association

壹、前言

統合主義（Corporatism）是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一種結構或體系，其特性是將社會團體或社會利益整合進入政府體系，通常建立於壟斷性的基礎之上，或者在國家的指導、保護及控制之下，藉以達到調和的國家發展。統合制度的形成，肇因於政治經濟體制的危機、國家和社會團體的相對性的地位，或者基於國家機關的發展策略（丁仁方，1999）。

Howard Wiarda（1997）歸納統合主義的歷史發展，發現有 4 種不同型式。其中，顯明的統合主義（manifest Corporatism）又被稱作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或威權統合主義（Authoritarian Corporatism）。Phillippe Schmitter（1974）指出，國家統合主義或威權統合主義多存在於自由主義傳統弱、資本主義發展晚、傾向威權主義及新重商主義的國家，其行政權力集中，有一黨獨大的政黨系統、象徵性的選舉，以及強調意識形態的行政體系（丁仁方，1999）。Guillermo O'Donnell（1977）研究拉丁美洲統合主義的發展，發現一種「兩面的（bifrontal）」的特質，即國家化（statizing）和私域化（privatist）的發展同時存在。國家化包含國家組織對市民社會的征服和控制，私域化則是國家領域對市民社會組織性利益代表的開放。

1950 年 8 月 5 日至 1952 年 10 月 10 日期間，中國國民黨鑒於痛失大陸、播遷來臺，部分黨員投靠共黨、部分黨員未能來臺，黨組織支離破碎，為痛定思痛、振衰起敝，進行改造運動（袁公瑜，2003）。改造後，國民黨理想中的黨國社會體制確立。國家方面係以黨領政，黨的組織從中央、省、地方縣市，層級分明且對應政府體制而設置，可明確提供指示。社會方面，依當時《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規定，將人民團體分為職業團體與社會團體，職業團體包括：農民團體、

漁民團體、勞工團體、工礦團體、商業團體、教育會，以及自由職業團體（新聞記者屬於此類），搭配各類職業團體的特別法，諸如：農會法、漁會法、工會法、商會法、記者法……等（張瑞玲，1990），再輔以《國家總動員法》之規範，落實威權統合。這種情況下的社會團體，成為一個強制性、壟斷性、排他性、層級組織性的控制體系，缺少與政府制度協商、合作的意義，更多的是成為政黨的附屬品，在人事和經費控制下，完成國家的政治性功能（丁仁方，1999），可謂為類政府組織。而團體的背後，又有各級職業黨團與之對應。國民黨改造運動對於社會基礎的強化達到了一定的效果，特別是青年、婦女、勞工與農民，組織滲透與控制都比大陸時期有所進步（陳曉慧，1998）。

與新聞事業相關的社會團體，也在此際先後成立，如：1946 年成立「台灣省新聞記者公會」、1949 年 12 月奉准成立的「台北市報業公會」，以及 1951 年成立「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等。體制雖是如此確立，但因職業別有不同重視程度和先後次序，效果未必盡如預期，以新聞界而言，改造成效是不如青年、婦女等領域的，新聞黨部的成立是改造運動之後 13 年的事。根據彭明輝的研究，「政策不明確、且無集中事權、統一領導的新聞政策機構」，雖然國民黨改造委員會也曾提出《新聞宣傳指導綱要》，但實踐方面頗有缺陷（彭明輝，2001）。

楊秀菁的研究中，提及一個彭明輝未探討到的原因，即改造初期，國民黨的派系問題仍未完全解決。楊秀菁也指出，臺灣新聞媒體或團體的發展，並非在遷臺（戒嚴）後，就進入一種緊張的狀態，「50 年代初期國民黨的新聞言論尺度還是比較開放的」，「整個管制的工作到一九六〇年達到最高點」（楊秀菁，2002），此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原因延緩了新聞界被統合的進程，即自清末以來，華文新聞事業邁向現代化過程

中，崇尚自由主義的傳統，以「第四權」自居。這也說明為何在威權統合的初期，能有公共領域運作的空隙。

「台北市報業公會」（以下簡稱為報業公會）於 1949 年由臺北市各報聯合發起，同年 12 月 10 日奉准成立，經過兩次籌備會議，隔年 1 月 25 日在臺北市省議會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正式宣告成立，並通過二項決議：一是該會宗旨為「維護增進同業之公共利益及矯正弊害，並服務社會」，另一是當時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所擬的「報人信條」（中華民國六十年新聞年鑑編輯委員會，1971）。由於是產業公會，係以組織（報社）為加入公會的會員單位，而非個人。依會章規定，「設理事九人、監事三人。理監事互推常務理事三人，輪流值月，處理日常會務，並互推常務監事一人」，並無理事長之設置。1 月 27 日於新生報會議室補行選舉理、監事，選舉結果：中央日報、台灣新生報、中華日報、公論報、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華報、掃蕩報等 9 報當選理事；自立晚報及國語日報等兩報當選監事。首屆監事呈現不足額的狀態，係因當時臺北市的報社家數還不足 12 個，全部的會員代表都必須擔任理、監事。

依照《人民團體法》與國民黨改造的黨政架構概念，產業團體與職業團體應依照第 11 條第 3 款規定：「依法有級數組織之人民團體，應先組織其下級團體，有過半數之下級團體組織完成時，得發起組織其上級團體。」由下而上分級設置。的確，「中華民國報紙事業協會」於 1955 年 8 月 16 日在臺北舉行成立大會，「台灣省報紙事業協會」則於 1972 年 10 月 10 日正式成立，但從《新聞年鑑》的記載、組織的存續與史料保存，以及報紙相關的報導來看，除了「台北市報業公會」之外，其他有關報紙的產業公會團體都未積極運作。每隔 10 年出版 1 次的《新聞年鑑》，甚至還會忘記「中華民國報紙事業協會」的存在。

回顧「台北市報業公會」的活動，可分為兩大類，即一般性會務與特殊性活動。一般性會務的內容，主要的是服務報業，不乏人性關懷與人情趣味，更重要地，也展現自清末士人辦報所建立的專業精神——立言，以國家興亡為己任、以言論救國報國的情操，特別是協力政府的反共言論與外交活動；至於特殊性活動，基於整體報業的共同利益和作為媒體的責任所發起之請願活動，包括爭取新聞用紙、爭取報業免稅，以及反對政府修訂《出版法》（夏士芬，2020）。而這兩類活動，恰恰反映了威權統合主義下，社會團體的雙面特性，既有類政府組織的色彩，又反映了公共領域的性質。

然而，隨著前述新聞界統合效果不彰的原因逐一解決，新聞管制的工作到 1960 年代進入高峰，報業公會作為一個新聞性的社會團體，公共領域的空間受到極度壓縮，所能做的只有服務工作，甚而成為政府之侍從，未曾再提出請願，直到解嚴前夕。由於報業公會本身對早期檔案資料保存有限，本文藉由「全國報紙資訊系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藏國家檔案，以及年鑑、黨務彙編等史料，重現 1950 年代的「台北市報業公會」，如何協力政府扮演類政府組織的角色，又如何發揮公共領域的功能，與政府周旋以爭取報業的共同利益，是為臺灣公共領域之轉型一頁特殊的篇章。

貳、作為類政府組織的報業公會：協力政府

此處將從統合角度，分三個面向介紹報業公會作為報業壟斷性的公共領域、政府的延伸，如何協力政府進行各項活動。

一、報業服務

作為報業的公會，從事各項橫向聯繫、情

誼交流，不盡然是協力政府的工作，也是報業公會職責所在，也有許多工作是與記者公會，編輯人協會合力進行，包括共同推派代表參與國際性新聞會議等事務，例如：「國際新聞協會（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IPI）」、「世界中文報業協會」，以及「亞洲人民反共聯盟」等，都可看出公權力在上位運籌帷幄的影響力。

（一）成立記者之家

成立「記者之家」是報業公會成立後，由記者公會的領頭，會同編輯人協會，以及外勤記者聯誼會，共同完成的第一份工作。1951年9月16日「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舉行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決議之一便是：「『記者之家』進行籌備方案，原則通過，交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推定專人會同報業公會，編輯人協會，及外勤記者聯誼會三新聞團體合力辦理，……」（中央社，1951年9月16日）；記者公會於1952年12月23日正式開幕啟鑰（聯合報，1952年12月23日）！報業公會該年度的常務理事—葉明勳、林頂立、李玉階等三人，同時擔任記者之家管理委員會委員（中央社，1952年10月16日）。

臺北市的「記者之家」位於臺北市西寧南路與開封街二段交會處，1950年代時，《中央日報》、《聯合報》、《徵信新聞》等報社都在附近。建築土地為臺北市所有，成立時需籌募基金，也曾獲得北市議員的贊助（中央社，1952年5月31日）。落成後，成為新聞相關團體主要活動會所，舉辦會員大會、演講活動，共商請願事宜也都在此，報業公會的請願書或共同聲明，多由此出發。

（二）舉辦專題演講

舉辦專題演講並非報業公會主要的活動項目，但從為數不多的演講活動中，其議題和主講

者的轉變，可看出耐人尋味的蛛絲馬跡。

1952年底胡適自美返國，隔年1月7日報業公會在新落成啟用的記者之家舉辦歡迎茶會，出席者逾百人，包括各報社長、總編輯及主筆。胡適在茶會中致詞演講約一個小時，以梁啟超辦《新民叢報》和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運動為例，並從自身辦《新青年》雜誌、推動白話文運動，鼓勵新聞從業人員要看重自己的力量，他說：「只要有信心，所謂『功不唐捐』，努力終不白費；只要本身主張站得住腳，有材料、有證據，以公心、平心的態度，來批評、提議，以契而不捨的態度，持久下去，沒有不成功的。」茶會由報業公會輪值常務理事李玉階主持，並稱胡適是「為自由民主奮鬥的老鬥士」（聯合報，1953年1月8日）。

其實，在這場茶會舉辦的前一天，《聯合報》已有活動預告，活動當天又再發稿預報，隔日有大篇幅（2,086字）報導，記述演講紀要，顯見報刊對這位「為自由民主奮鬥的老鬥士」的重視。

1953年4月15日，報業公會會員大會邀請政府發言人沈昌煥擔任貴賓蒞會演講，沈昌煥是國民黨第四組主任，這場演說《聯合報》也有大篇幅（1,878字）的報導，演講內容圍繞著反共抗俄的議題，呼籲：「由中國報界人士應倡導一項廣泛的運動，號召海內外忠貞愛國的報人以及東南亞各自由國家的報業，在反共抗俄的同一目標下不分地域，不分國籍、把精神、力量熔於一爐，共同為保持人類的文化、維護民主自由而團結奮鬥」（聯合報，1953年4月16日）。

1954年4月29日，報業公會舉行第五屆會員大會，與會貴賓包括行政院新聞局長吳南如委派朱虛白代表出席、臺灣省新聞處長張彼德，以及沈昌煥、許聞淵等，僅有沈昌煥發言的三項重點被詳細記錄於中央通訊社所發的新聞稿中，其他來賓的致詞則以「語多慰勉」一筆帶過（中央

社，1954年4月30日）。與會貴賓分別為黨、政新聞事業主管機關之首長，從報導比例，可看出首長之間受重視的程度，黨高於政，與國民黨威權統合之以黨領政的精神相合；又，不論黨、政，本應是第四權的新聞媒體，都是黨政首長「慰勉」的對象。

1955年5月31日，報業公會、記者會、編輯人協會、外勤記者聯誼會、廣播聯誼會等5個團體聯合舉行歡迎茶會，主角是甫自日本考察歸來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馬星野，說明日本的現狀，報載「日本政治很民主，經濟很繁榮但還不夠安定，尤其一般人士對於共產黨的危害世界，尚缺乏進一步的警覺。馬氏希望我國各方人士對日本情況多加研究」（中央社，1955年6月1日）。綜上所述，在為數不多的演講活動中，所邀請的演講者，從自由派的胡適，暢談報業的力量，轉變為黨政新聞事業之主管，特別是擔任國民黨第四組主任的蒞臨，再三強調反共工作之重要性，係透過演講活動，對新聞界提供工作指導。

（三）同業關懷與聯誼

報業聯誼為報業公會對內公關責無旁貸的任務。包括每年例行的元旦團拜，也包括報業同仁逝世，報業公會組團公祭等，特別是在1958年10月8日，為採訪八二三砲戰因公殉職的6位記者舉辦追悼會（註1）。

至於與報業主管的送往迎來，也是不可或缺的。1952年8月14日，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與報業公會在泉州街鐵路飯店共同舉辦了一場茶會，歡迎沈昌煥接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主任，卸下第四組主任一職的蕭自誠接任《中央日報》社長，這場茶會也就成為蕭自誠的歡迎會和卸任社長馬星野的歡送會。沈昌煥於會中致詞，自許作為黨與新聞界的橋樑，提到「……建議新聞界對一切新聞的處理及言論甚至廣告文

字，均應針對俄寇共匪的陰謀，針對國際環境及救國的需要而發。以提高國人的警覺性與戰鬥性；對報紙的內容及發行，尤應注重普遍性。……」（聯合報，1952年8月15日），不無訓勉的意味。

一星期之後，就在同一地點，報業公會又舉辦歡送董顯光出使日本的茶會，董顯光早年在天津辦過報紙，1947年間擔任過新聞局局長一職，臨行前對報業的期勉「……與論報導與外交關係之不可分，並希望報界諸友人之督策及協助。……」（聯合報，1952年8月22日）。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調任或履新，也是設宴歡迎的對象；甚至連立法院內爆發委員之間的肢體衝突，報業公會也參與大陣仗的慰問團（註2）。

二、國事服務：促進國際新聞交流、倡議民主自由與反共

（一）促進國際新聞交流

蔣中正於1957年7月16日接見報業公會重要成員時，清楚表達肯定之意，載明：「對全國報業及新聞界，這幾年來和政府密切合作，支持反共抗俄工作，表示慰勉」（中央社，1957年7月17日）。1950年代，報業公會所進行國際新聞交流羅列如下表，這類活動在1960、1970年代更顯頻繁（夏士芬，2020）。綜觀活動的內容，可歸納出幾個重點：同申反共、展現中華民國的進步，與反攻大陸的實力（詳表1）。

除了屢邀同樣是反共陣營國家的新聞團體來訪，參觀自由復興基地—臺灣的各項建設之外，我國新聞團體也曾組團出訪。

1952年6月，臺北記者訪菲團赴馬尼拉，會晤菲國外長伊利陸爾德時對記者說，「亞洲需要經濟上的安定及政治上的進步，如果我們能完成經濟及政治上的福利，共產主義即無用武之地。……我們對於臺灣的進步異常欽佩。」訪問團也獲得季里諾總統親自接見，他對訪問團說，

表 1 戒嚴時期報業公會進行國際新聞交流一覽表

活動時間	參與人員	活動內容	報業公會角色與活動概況
1952.1.2	曼谷記者訪臺團	參加總統府開國紀念典禮，與克難英雄團拜，參觀華僑愛國運動展覽會	報業公會設宴歡迎
1952.5.10	日本吉田首相之私人代表緒方竹虎	晉謁總統獻陳意見、赴圓山弔太原五百完人塚、參觀左營海軍基地	報業公會及記者公會聯合舉辦酒會
1952.6.19-24	紐約時報發行人塞資柏格夫婦	訪晤我朝野人士與美國在臺灣官員，並將赴金門及臺灣全省各地參觀	記者公會及報業公會設宴歡迎
1952.10.12-19	讀賣新聞中日友好飛行訪問團團長我妻隆雄一行 7 人	搭讀賣新聞社「空中編輯室」專機來臺，訪問及攝製臺灣進步的現象，將向日本報導，拜會政府單位	拜會報業公會、記者公會
1953.3.18	美國斯克利甫斯霍華德報系主持人霍華德	訪晤外交部長葉公超、參觀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赴日月潭、訪晤臺灣省主席吳國楨	記者公會及報業公會聯合舉辦歡迎茶會並回答自由中國報人所提問題
1953.11.16-25	香港新聞界回國致敬團團長劉劫餘一行 20 人	拜會政府單位及新聞媒體	記者公會及報業公會設宴歡迎
1953.12.20	香港文化工商人士回國觀光團團長陳向元一行 14 人	拜會政府單位，又分文化、工商兩組分別拜會相關單位	拜會報業公會、記者公會，及編輯人協會
1954.4.22-27	日本青年飛行訪問團團員 6 人	參觀國父史蹟紀念館、民航設備	報業公會設宴歡迎
1955.6.11	越南新聞界訪問團范春泰等	期中越兩大民族更團結更合作	報業公會設宴歡迎報告自由中國報業近況
1957.4.17-20	泰國記者訪華團一行 19 人	拜會官員訪問我三軍基地及工業建設	報業公會設宴歡迎
1958.2.12	日本記者訪問團團長橫田實等人	晉謁副總統陳誠、監察院長于右任等、參觀土地改革	報業公會舉辦茶會
1960.1.14	越南自由太平洋通訊社社長雷震遠神父	代吳總統表達對在越華僑讚佩、對儒家文化價值的認同、中越兩國繼續合作之意	記者公會、報業公會和編輯人協會聯合舉辦歡迎茶會
1960.10.10	泰國華僑報界觀光團團長楊健行等	回國表示對政府的擁護，對祖國的熱愛和向國內新聞界先進學習、參觀報社	報業公會、記者公會和華僑報紙聯誼會等三個團體舉辦歡迎茶會，表達國內新聞界同業願意儘力協助海外華僑報解決困難

備註：本表所載日期係依報導直接登錄或推斷，若無法得知確切到訪期間，則列報導日期。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聯合知識庫》相關報導

「我們要聯合一起共同作戰」，並強調「所有民主國家『重整道德』以防制共產主義的重要性。」此外，在相關宴會場合，也和菲律賓報業人員及美、法、英駐菲記者交流；在僑界所舉辦的晚宴上，台灣新生報總經理趙君豪致詞報告臺灣的進步，「并稱：明年每一耕者都可以有其田。他說：臺灣政府正竭力促進農民福利」（中央社馬尼拉二十七日專電，1952年6月28日）。事實上，《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是1953年1月26日起公布施行，也就是說訪問團也負起向海外同胞預告、宣揚、介說政府政策的任務。

綜觀行程內容，宣慰僑胞、新聞外交……，實際上已具有特使團的作用，新聞界在晉見對方國家元首時，也扮演「傳話者」的角色，就如同1960年1月，越南自由太平洋通訊社社長雷震遠神父訪臺期間，不斷提及越南總統吳廷琰訪問的態度和觀點一樣（益世社記者劉牧徐，1960年1月14日及中央社，1960年1月14日）。

（二）倡議民主自由與反共

「亞洲人民反共聯盟」（簡稱「亞盟」）係由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大韓民國大統領李承晚、菲律賓總統季里諾共同倡導，在1954年成立，由於宗旨崇高，廣獲認同，1967年擴大為世界性組織，是為「世界自由民主聯盟」（簡稱「世盟」）的前身。

不論「亞盟」或「世盟」，我國都是創始會員單位，也是組織成立以來最支持的會員國家，「中華民國總會」由國內320個社會團體所組成，負責運動之推進（世界自由民主聯盟總會，n.d.）。報業公會就是這三百多個社會團體之一，推派《中央日報》董事長胡健中為代表（中央社，1954年8月1日）。

新聞界的國際交流，必然也是受國家國際地位的影響。1950年代，報業公會從事國際新聞交流共11次，60年代則增加為17次，但隨

著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前幾年已開始有減少的趨勢，1977年後幾乎是停擺的狀態（夏士芬，2020）。在國際互訪開始減少時，政府透過報業公會及相關新聞團體改以參加國際新聞組織方式，保持與國際聯繫，共同高喊反共聲音。

如果前述兩項工作，可視為反共抗俄時期的「大外宣」，以下兩項工作就是政府透過報業公會所進行的「大內宣」。

（三）參訪、報導國家建設

舉凡國防建設、交通建設、經濟建設等，報業公會經常組團前往參訪，一來是應政府相關單位的邀請，二來確實也具有新聞價值，可作為媒體報導的內容。

例如1954年8月5日，「為明瞭我三軍年來的進步實況，並向三軍致敬」，報業公會特地組織軍中訪問團，進行為期4日的訪問，行程從臺北出發，首站飛往金門前線，後又轉往澎湖、屏東、高雄、岡山、臺南等基地，連日奔忙訪問各軍事單位，「並向軍事首長分別獻巨幅國旗致敬」。此團號稱「臺灣光復後本省報界首次且係最大一次的軍中訪問」，主要成員是所屬15個單位報社負責人，並有國防部及新聞局官員隨團協助，還有1名攝影記者隨行。回臺北後，發表許多正面的感言、振奮人心，並呼籲海內外的優秀的青年，踴躍從軍，為國效勞。團員們謂（中央社，1954年8月6日及中央社，1954年8月9日）：

「百聞不如一見，我們此次訪問前後方軍事基地，親自看到軍中的一切事實，與我們過去經常所報導的不但是完全一致，而且三軍的長足進步與輝煌的成就，比較我們過去的報導更有進步，且猶在繼續進步中，這種現象，使我們對反攻必勝復國必成的信念，益加增強。」

「我們前後方的戰士都能發揮克難精神，無時不在提高警覺作反攻殲敵的準備，我們認為在

後方此時此際，無論在精神或生活方面，我們都應向戰士們看齊，負起反攻大陸的神聖任務。」

「最近朱毛匪幫大肆叫囂「解放臺灣」，由於我們前後方士氣旺盛，防禦工事固若金湯，無隙可乘，如匪軍真敢冒險來犯，本團經此次軍中訪問所得的印象，認為匪軍這種妄舉，無異是給予我們殲敵的一個良好機會」。

1959 年 12 月，報業公會再度組織金門前線訪問團，規模維持 1954 年的規格（軍聞社，1959 年 12 月 27 日）。

交通建設方面，1958 年 3 月 27 日報業公會所組成的橫貫公路參觀團，前往花蓮參觀太魯閣至天祥段的艱鉅工程，團員除了報業負責人，還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秘書長趙聚鈺、處長王茂山、公路局長林則彬陪同，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馬星野領隊（中央社，1958 年 3 月 27 日）。

緊接著花蓮的參訪，3 月 30 日台北市報業參觀團一行 16 人南下高雄，參觀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台灣電力公司南部分公司，訪問新生報高雄分社，中國晚報社；晚間又轉往臺南，訪問中華日報與成功晚報，參觀嘉南大圳烏山頭水庫、新營酵母廠、南港油井等地（中央社及聯合報，1958 年 3 月 30 日）。透過參訪的報導，向民眾說明國家的建設成果。

（四）舉辦自由中國攝影展

報業公會除了服務報業、服務國家、服務社會，還有舉辦文化服務的活動，可看出報業公會已成為國家機構的延伸。

1952 年青年節所主辦的「自由中國影展」，由教育部、國防部、國防部總政治部、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政府發言人辦公室、臺灣省教育廳、新聞處、省黨部、臺北市政府、市報業公會、中國文藝協會、臺灣文化協進會、中國

美術協會等 12 個單位聯合舉辦，具體內容包括「宣揚領袖偉大及我反共抗俄陣容之堅強」、「描述反共基地生產建設之新生氣象」……等（聯合報，1952 年 2 月 27 日），極具高度政治宣傳的意味。

參、作為公共領域的報業公會：與政府周旋

作為類政府組織的同時，「台北市報業公會」並未遺忘其公共領域的職責，必要時，必須和政府周旋，具代表性的議題之一就是爭取報業廣告收入免徵營業所得稅。

政府遷臺後實施「報禁」，陸續限紙、限張、限證且限印（林麗雲，2008）。在眾多對新聞媒體給予限制的法律條文中，也有對媒體的特別優惠，即 1950 年代初期的免稅規定（聯合報，1959 年 2 月 2 日）：

對新聞應否視同一般營利法人開立統一發票一事，財政部廳曾加商討，結果財政廳以（四〇）丑養財甲〇五三〇三代電釋示：「凡各通訊社掣給自行印製之收據，照章貼用印花，毋庸開立統一發票。」財政部（四〇）發〇二七四七號令更進一步解釋：雜誌視同報紙，免徵營業稅並免用統一發票。」准此，新聞業乃正式免稅。

至 1955 年 12 月《營業稅法》（自 2001 年 7 月 9 日起改名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修法時，對此優惠增加但書。原本第 6 條明列免徵營業稅之範圍有 12 類，其中一類即是「依法登記出版之報社，雜誌社，通訊社及廣播電台」，修法新增但書內容為「但其所收廣告費及販賣非本身出版品部份，仍應征收營業稅」（註 3），亦即發行所得可以免稅，但廣告收入必須課稅。

廣告收入為報業生存之主要命脈，1950 年代的商業廣告不多，來自公部門的公告廣告所佔比率較大。臺灣省政府另有一項優惠政策，但並非所有報業雨露均霑，只有特定黨營媒體能夠受惠，即政府的廣告至少要在黨或公營報紙刊登。這變相保障《中央日報》和《台灣新生報》有一定收入，至於民營報刊，可登可不登；對機關而言，與其登 1 家、得罪其他家，而預算又不足以每家都登，乾脆都不登，這對民營報刊而言是很大的損失（陳國祥、祝萍，1988）。

廣告收益對報社而言至關重要，爭取廣告本已不易，如果又要課稅，再加上各項限制，更增添報社經營之困難。1954 年 2 月 20 日，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後，引發了報業的不安。

一、第一次為爭取新聞事業免征所得稅向立法院請願

根據立法院檔案資料顯示，為了免稅之事，報業公會曾經 3 次向立法院請願。第 1 次是 1954 年 4 月 26 日，就在行政院將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後兩個月，以「代電」方式行文立法院，提出「請於審議所得法修正草案時明白規定新聞事業免征所得稅」之願（如圖 1），主要理由有三：

- （一）新聞是業屬於文化事業，具有重大社會教育意義，應受《憲法》第 13 條之保護，且《出版法》第 25 條也明定新聞紙之發行得免徵營業稅。
- （二）除於反共抗俄時期，大陸未復、匪敵當前，一切依賴反共抗俄之總體戰為前提，而總體戰之重要一環即新聞事業，自由中國報業在過去 5 年，對於反共抗俄宣傳工作有顯著成效。
- （三）世界各國對於新聞發布之機械設備日益革新，而國內新聞事業之設備極待加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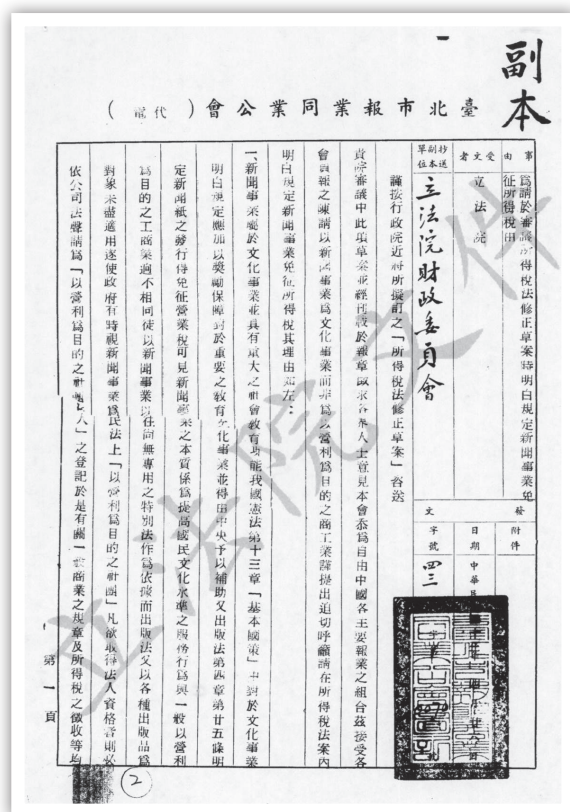


圖 1 1954 年 4 月 26 日「台北市報業公會」請願書

備註：本圖為 3 頁原稿之第 1 頁。

資料來源：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4 年 5 月 3 日），請願案抄送程序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3/9924.01/0056/0009/008

基於以上 3 點，期立法院在審查法案時，能於第 11 條「左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之列舉事項加入「新聞事業經營之所得必須用於改良擴充設備及本身事業之維持改進者」一款（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4 年 5 月 3 日）。

但這次請願沒有見諸報端，立法院的檔案中也沒有後續的資料。

二、第二次向立法院請願：橫跨兩會期、經九次聯席會議及多次院會討論，維持原狀

1955 年 12 月 30 日總統公布修正後《營業稅法》全文 29 條時，仍將依法登記出版之報社、

雜誌社、通訊社及廣播電台列在免征營業稅的範圍，卻多了「但其所收廣告費及販賣非本身出版品部份，仍應征收營業稅」這條但書。

這項規定，當然又引起報業高度的憂心，隨即報端提出呼籲，謂我國報業在設備上已落後於新聞事業進步之國家，維持現狀已十分不易，即使少數報社的經營還差強人意，用於改善設備尚且不及，實無盈餘可言，如果再以營利事業視之、進行課稅，將使報社經營更加困難，難以追求進步與發展，如能准予免繳營利事業所得稅，重申「俾各報能勉力維持，繼續擔負反共抗俄宣傳之命，……」之意（聯合報，1955 年 10 月 7 日）。

隔年，連同臺灣省各縣市民營報聯誼會、台灣省雜誌事業協會、台北市新聞通訊事業協會，以及中國廣播事業協會等 5 個新聞團體，認為修正後的《營業稅法》，「規定報社，雜誌社，通訊社，及廣播電台所收之廣告費，應征收營業稅及稅捐機關通知使用統一發票……與出版法第十五條相牴觸」，決定向財稅機關請求暫緩執行，並向立法院請願（聯合報，1956 年 7 月 21 日）。7 月 27 日，五團體再度於記者之家開會，決議推派代表分別向有關單位陳情，先予緩征，並請立法院修正但書。9 月 27 日，第三度會商後，提出具體的訴求是「修正營業稅法第六條第十項條文下半段，刪除『其所收廣告費及』等字樣」（中央社，1956 年 9 月 28 日）。9 月 6 日再以代電向立法院正式請願，如圖 2（共 2 頁），主旨為「廣告係新聞事業本身基本業務，不容分割，修正之營業稅法第六條第十項後段文字，敬懇 賜予研議修訂」，5 個新聞團體的訴求，獲得立法院的重視，經程序委員會提到第十八會期第二次會議討論，決定送請財政委員會審查，9 月 22 日程序委員會函請財政委員會進行審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9 月 22 日）。這又是一場新的戰役，雖說獲得立院的重視，但議決行動則顯得緩慢。

財政委員會隨即函邀各新聞團體推派代表列席 1956 年 9 月 29 日召開的會議（中央社，1956 年 9 月 28 日），於會中聽取團體代表的請願理由，報業公會代表李漢儀以「歐美各國對報紙減稅以至免稅之例證，說明我國新聞各業在現階段落後之情況下，應加以匡扶發展」、其他 4 會代表則「就各業情形補充陳述要求依照《出版法》第 24、25 條獎勵新聞事業之意旨，予以考慮」，相關意見據報載，也獲得財政委員會出席立委陳桂清、崔唯吾的同情（中央社，1956 年 9 月 30 日）。

聽取了報業的意見後，經財政委員會第十八會期第二次全體會議討論，並邀財政部賦稅署署長陳琮列席，10 月 6 日決議，五團體的請願案正式成案（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10 月 16 日；中央社，1956 年 10 月 7 日），提 10 月 19 日立法院院會加以討論。在立法院院會討論前夕，五團體於記者之家舉行了第六次會報，出席者三十餘人，由報業公會代表李漢儀（時任民族晚報社長）擔任主席，除確立訴求為刪除『其所收廣告費及』等字樣，並決定五團體各推派另為高級人員列席院會旁聽（中央社，1956 年 10 月 19 日）。10 月 19 日的立法院院會決議交財政、內政兩委員聯席會議審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10 月 27 日）。

11 月 15 日，提到財政、內政兩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繼續討論（中央社，1956 年 11 月 16 日），討論的結果是：邀請財政內政兩部暨請願單位代表列席說明（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11 月 15 日）。11 月 19 日舉行了第二次聯席會、12 月 1 日召開第三次聯席會，結論都是：邀俟另定期舉行會議繼續進行審查。第四次聯席會於 12 月 3 日舉行，決議還是「邀俟另定期舉行會議……」，但多了一個附註，「下次開會通知應再行敘明，本案業經四次會議討論意見相當集中接近決定階段即將表決本次會議請各位委員準時踴躍出席」（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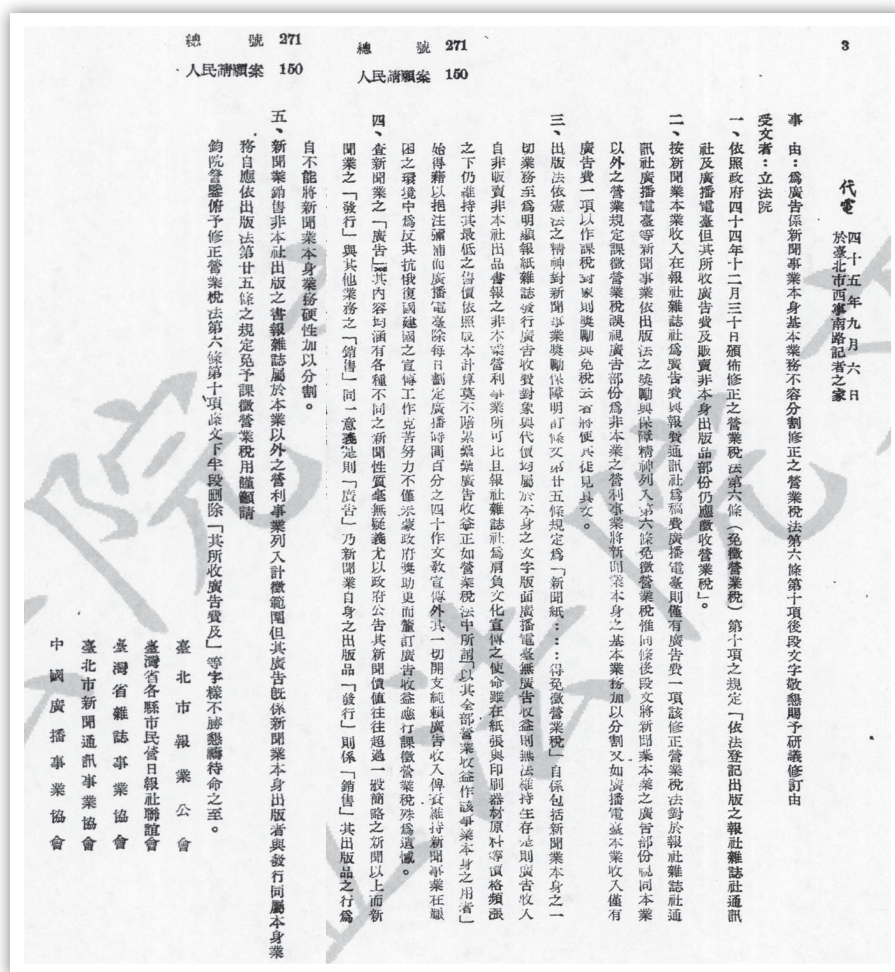


圖 2 1956 年 9 月 6 日「台北市報業公會」請願書

備註：原檔案為二頁，為節省篇幅，在不影響原資訊完整情形下，裁剪、合併為一頁。
資料來源：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9 月 22 日），請願案依院會決定送請財政委員會審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6/9924.01/0001/0001/001

11 月 19 日及 12 月 1 日），確實第四次聯席會議出席委員僅 23 人，較前三次會議的 33 人、29 人（財政內政兩部暨請願單位代表共 10 人未列入計算），以及第三次的 40 人，是最少的一次；但是，這個呼籲並沒有發揮效果。

12 月 13 日第五次聯席會議仍然只有 29 人出席，只能做出和第四次會議同樣的「決議」和「附註」（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12 月 13 日）。第六次聯席會很快地又於 12 月 17 日召開，只有 28 人出席，但終於有了較具體的結論（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12 月 17 日）：

一、就歷次聯席會議出席委員意見歸納為下列三種：

- （一）各該業廣告費營業稅均予免征。
- （二）一律不予免征。
- （三）差別待遇。

子、僅免征雜誌社通訊社及廣播電台等各業營業稅，報業廣告費營業稅仍應課征

丑、提高新聞業廣告費之營業稅起征點，使報業以外各業之廣告費收入（原始檔案中該字無法辨識）際免征營業稅。

第六次聯席會上還針對上述歸納意進行表決，表決結果：贊成第一種意見者10人、贊成第二種意見者5（或3）人，贊成第三種意見、子丑兩案者各有1人。於是，又依照表決結果做成甲乙兩案，報請院會決定，兩案的內容分別是（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年12月17日）：

甲案、接受請願案意見，修正營業稅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十款及營業稅法分類「計征標的」欄文字加入

（一）營業稅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十款修正文字：「十、依法登記出版之報社、雜誌社、通訊社及廣播電台；但其販賣非本身出版品部分仍應征收營業稅。」（註4）

（二）營業稅分類計征標的表第一類新聞業「計征標的」欄修正文字：「銷售非本身出版之書報雜誌之價額。」（註5）

乙案、不接受請願案意見，現行營業稅法毋庸修正

二、推定劉召集委員全忠於院會討論本案時補充說明。

兩委員會聯席會將上述結論函送程序委員會、提請院會討論時，還附帶提醒，「……本會期又行將結束，本案如不能於本月二十一日院會中提出討論，勢必延擱至十九會期」（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年12月20日）。

12月21日，本案提到院會討論，會中由財政委員會召集委員劉全忠先行說明兩委員會對此案的審查結果，接下來由委員進行發言，大部委員均支持免稅意見，但也是有表示反對的存在，「至散會時止，未獲結論」（聯合報，1956年12月22日）。也不完全是沒有結論，而是決議將請願案、委員於院會表達贊成或反對之發言紀

錄，以及各方相關意見，再送內政及財政兩委員會聯席會議作為參考、進行討論，1957年1月25日，立法院秘書處致函財政委員會（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7年1月25日）。

3月27日，財政、內政兩委員舉行第十九會期第一次聯席會議，僅23人出席，再度邀請財政、內政兩部官員列席，決議「下次會議繼續審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7年1月25日）。

第二次聯席會議於4月13日召開，共37人出席，歸納出四種意見，將定期舉行表決。這四點意見，是將上一會期第六次聯席會有關「差別待遇」決議再衍生（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7年4月13日）：

（一）接受請願意見，免征新聞業廣告費營業稅。

（二）新聞業廣告費營業稅除報社減半征收外，均予免征。

（三）新聞業廣告費營業稅除報社外，均予免征。

（四）不接受請願意見，新聞業廣告費營業稅不予免征。

第三次聯席會議，是院會決議前的最後一次聯席會、連續二會期的第九次聯席會，於5月30日在中山堂進行。出席委員23人，以口頭表決、無異議通過（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7年5月30日）：

（一）修正營業稅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十款文字：「十、依法登記出版之報社、雜誌社、通訊社及廣播電台；但其販賣非本身出版品部分仍應征收營業稅。」

（二）修正營業稅分類計征標的表第一類新聞業「計征標的」欄文字：「銷售非本身出版之書報雜誌之價額。」

也就是採納了第六次聯席會所表決通過的「甲案」，這結果應是五提案團體所樂見的！但是，結果完全不同。

1957 年底，11 月 5 日立院進行第二十會期第十二次院會，會中針對此案，贊成與反對兩方激烈辯論。根據媒體報導，反對刪除但書立委有 7 人，其主張：「廣告是商業行為，應課行為稅，且列舉如中央日報、新生報一條廣告數百元甚至千元以上，顯然係以營利為目的，不是以服務為目的，故應課稅，且修改稅法則影響立院威信等。」相對於這 7 人 78 字的報導，報刊對 5 位贊成立委的剴切陳詞，則是逐一報導，有 902 字之多。贊者刪除但書者之主張，包括（一）世界各國報紙發行收入均係賠本，均靠廣告收入挹注，故各國政府為扶植新聞事業，無不免稅，我國出版法第 25 條也有明定；（二）前新聞業之艱苦情形，如再征稅，實無異給予重大打擊；（三）「發行得免徵營業稅」所指之「發行」，係包括廣告在內，一張報紙，有新聞，有評論，有副刊，有廣告，廣告根本不能離開報紙，而單獨發行；（四）與其為了新聞業每年 10 餘萬元廣告稅爭得面紅耳赤，更應注意 20 至 25 億的龐大漏稅；（五）新聞事業負有宣揚國策提高文化的偉大使命，政府應該獎勵，事實上報紙有廣告，雜誌廣告較少，通訊社廣告更少，而廣播電台則全靠廣告，如要征稅，只有關門大吉了（華聯社，1957 年 11 月 6 日）。報業公會之成員報以如此不平衡手法報導此次院會之討論，也是透過媒體表達自身的立場。

11 月 8 日第二十會期第十三次院會，終於對報業公會等五團體的請願案做出決議：「台北市報業公會等為廣告係新聞事業本身基本業務，不容分割，修正之《營業稅法》第 6 條第 10 項後段懇請研擬修訂案，經表決結果，多數委員贊成營業稅無庸修正」（聯合報，1957 年 11 月 9 日）。

仔細觀察出席人數，發現這樣的結果是不難預料的。兩委員會的聯席會議法定人數是 28 人，但 9 次聯席會中達此標準者就有 5 次，採取表決的兩次聯席會，出席人數都只有 23 人，且歷次會議出席人員名單大致相同，也就是說，為此議題前來開會的是同一群人，會來開會、且待到最後、又表決支持請願案的委員，是聯席會中的少數人；嚴格來說，兩次表決都沒達到法定人數，其表決結果的正當性，也是有可議之處的。

總結報業公會等 5 個團體請願的論點包括（聯合報，1959 年 2 月 2 日）：

（一）出版法第二十五條明定新聞紙、雜誌等免徵營業稅，此為符合憲法規定獎勵之旨，似不宜節外生枝，多此一筆。（二）新聞事業對文化教育貢獻甚大，政府極宜扶植，似不宜在涇涇收入中尋求稅源。（三）目前好多雜誌，實際上發行編經一人辦理，每月艱辛苦撐，若辦營利登記，稅捐負擔之外，更須繳稅設帳，至少須專設一人主持，於是開支頻增，勢必促使更難維持。（四）廣播電台根本無發行收入，維持全賴廣告，若課以稅，稅捐與開支驟增，勢必亦難以維持。

但從結果看來，政府並沒有接受這些觀點。反對請願內容的立法委員，有些是基於公平賦稅的原則，如果出版精神糧食可以免稅，那人民生存必須的糧食更應免稅；有些則主張憲法縱有保障出版之規定，但可以其他方式予以獎勵，而非免稅；也有從國家應確保有足夠稅收的角度，認為新聞業不該免稅，還說「本席對這個請願案未敢贊成，將來我們沒有收入又拿什麼反共抗俄呢？希望從事新聞事業的先生們踴躍輸將一點，不要五百九十幾家連一萬五千元都不肯納，這對我們反共的前途是很危險的。」甚至有委員認為，請願成案、表達贊成，「惟以不願得罪報業者居

多」(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1957 年 1 月 25 日)。

就議題而言, 以目前的觀點來看, 是比較缺乏正當性的, 報禁解除、頻道開放, 新聞媒體也成為一個開放市場, 以自由競爭模式運作, 斷無免稅之特殊優惠待遇; 但在當時, 新聞媒體的確是特殊產業, 正因其具有強大的宣傳功能, 又因國家所處環境危急, 必然成為統合的對象, 以致媒體經營受到諸多的限制, 給予限制的同時, 必然也要給予一些特別的待遇, 但在不對等的關係下, 只能說: 特別待遇可以給, 自然也能收回。

肆、結語

「台北市報業公會」誕生於 1949 年, 正值國共內戰失利、撤退來臺的國民黨政府進行威權統合的體制之際。國民黨面對挫敗與吃緊的國際情勢, 很自然順理成章重拾抗戰時期的「國家至上」精神, 一切物力、人員都在國家動員的範疇中, 憲法賦予的新聞與言論自由遭到凍結, 新聞媒體、新聞團體與新聞教育都在黨國體制統合下成為反共抗俄的尖兵, 國民黨第四組取代政府機關, 成為新聞領域的主管機關。但國民黨威權而非極權, 加上內部派系的問題, 以及報業與報人自清末現代化以來, 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 就是

以自由、獨立為目標, 縱使生長的土壤中, 民主的養分並不多, 但以某種程度的抗爭, 也延緩了新聞界被統合的進程。

1948 至 1958 年間的「台北市報業公會」一方面扮演類政府組織的角色, 協力政府完成許多工作, 對外參與國際新聞性團體與活動, 共同反共抗俄, 對內積極報導國家種種建設與成果, 同時提供許多社會服務; 另一方面, 此一時期報業公會仍有空間扮演公共領域的角色, 除了基本的同業服務, 為了爭取新聞用紙的價格平穩、供貨正常與品質提升, 以及新聞事業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報業公會集合黨公民營報業共同向政府請願。之後, 又為了阻擋《出版法》不當修正, 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據理力爭, 但政府態度強硬, 完全無視新聞界的請願與呼籲, 《出版法》如政府所願納入「撤銷登記」的罰則。請願抗爭失敗, 在後續的戒嚴歲月中, 報業公會未再提出任何請願, 只能扮演宣傳或侍從角色, 「無黨無派獨立經營」成了報業與政府所能維持最遠的距離。

本文透過報業公會, 探究 1950 年代的政治環境如何步入緊縮, 報業公會如何因應局勢, 又如何與政府周旋, 雖然最後以失敗收場, 公共領域的空間萎縮, 但其努力仍值得被記錄。

參考文獻

- 丁仁方 (1999)。《威權統合主義：理論、發展與轉型》。臺北：時英出版社。
- 中央社 (1951 年 9 月 16 日)。記者公會昨通過 籌設記者之家進行方案 記者休假制度一案 及函請各單位辦理。《聯合報》，3 版。
- 中央社 (1952 年 10 月 16 日)。「記者之家」組織規程通過 管理委員推定。《聯合報》，3 版。
- 中央社 (1954 年 4 月 30 日)。台北市報業公會 改名報業協會昨開會員大會選出理監事 沈昌煥談報業使命。《聯合報》，3 版。
- 中央社 (1954 年 8 月 1 日)。亞盟中國總會 常務理事選初。《聯合報》，1 版。
- 中央社 (1954 年 8 月 6 日)。團員名單。《聯合報》，3 版。
- 中央社 (1955 年 6 月 1 日)。新聞界茶會 馬星野談日本新聞事業。《聯合報》，1 版。
- 中央社 (1956 年 9 月 28 日)。請免廣告營業稅 立院財委會 定明日討論。《聯合報》，3 版。

- 中央社（1956 年 9 月 30 日）。新聞業五團體 請免課廣告營業稅 向立法院請願。《聯合報》，1 版。
- 中央社（1956 年 10 月 7 日）。報業公會請願案 立院審查成立議案 將提付院會討論。《聯合報》，3 版。
- 中央社（1956 年 10 月 19 日）。五新聞團體 昨舉行會報。《聯合報》，3 版。
- 中央社（1956 年 11 月 16 日）。立院兩委會 續討論報業公會請願案。《聯合報》，1 版。
- 中央社（1957 年 7 月 17 日）。總統接見報人 勉注意兩點 報導新聞提高警覺 教化社會轉移風氣。《聯合報》，1 版。
- 中央社（1958 年 3 月 27 日）。參觀橫貫公路 北市報人 今飛花蓮。《聯合報》，3 版。
- 中央社（1960 年 1 月 14 日）。臺北新聞界三團體 昨茶會歡迎雷震遠 雷神父談吳廷琰重視中國文化 認應加強兩國經濟合作。《聯合報》，3 版。
- 中央社及聯合報（1958 年 3 月 30 日）。北市報人 由高抵南 今訪嘉南圳。《聯合報》，3 版。
- 中央社馬尼拉二十七日專電（1952 年 6 月 28 日）。季里諾面告我記者團 擬來台答訪總統 並續支持太平洋公約 菲外長亦極力表贊同。《聯合報》，1 版。
- 中華民國六十年新聞年鑑編輯委員會（1971）。《中華民國新聞年鑑》。臺北：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
-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4 年 5 月 3 日）。請願案抄送程序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3/9924.01/0056/0009/008。
-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9 月 22 日）。請願案依院會決定送請財政委員會審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6/9924.01/0001/0001/001。
-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10 月 16 日）。財政委員會決議請願書應成立為議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6/9924.01/0001/0001/001。
-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10 月 27 日）。請願案依院會決定送請財政、內政兩委員聯席會議審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6/9924.01/0001/0001/001。
-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11 月 15 日）。邀請財政內政兩部暨請願單位代表到聯席會列席說明。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6/9924.01/0001/0001/001。
-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11 月 19 日及 12 月 1 日）。第二、三次聯席會議紀錄、第四次聯席會議紀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6/9924.01/0001/0001/001。
-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12 月 13 日）。第五次聯席會議紀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6/9924.01/0001/0001/001。
-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12 月 17 日）。第六次聯席會議紀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6/9924.01/0001/0001/001。
-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6 年 12 月 20 日）。第六次聯席會議紀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6/9924.01/0001/0001/001。
-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7 年 1 月 25 日 a）。立法院秘書處致函財政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6/9924.01/0001/0001/001。
-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7 年 1 月 25 日 b）。第十九會期第一次聯席會議紀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6/9924.01/0001/0001/001。
-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7 年 1 月 25 日 c）。立法院秘書處致函財政委員會附帶參考資料：委員於院會表達反對之意見。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6/9924.01/0001/0001/001。
-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7 年 4 月 13 日）。第十九會期第二次聯席會議紀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6/9924.01/0001/0001/001。
-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1957 年 5 月 30 日）。第十九會期第三次聯席會議紀錄。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0046/9924.01/0001/0001/001。
- 世界自由民主聯盟總會（n.d.）。歷史沿革。檢自 <http://wifdrc.org.tw/zh/2019/04/08/歷史沿革-2/>（Oct. 27, 2019）。
- 林麗雲（2008）。變遷與挑戰：解禁後的台灣報業。《新聞學研究》，95，183-212。
- 軍聞社（1959 年 12 月 27 日）。北市報業公會 組團訪金門。《聯合報》，3 版。
- 益世社記者劉牧徐（1960 年 1 月 14 日）。雷震遠神父口中的吳廷琰。《聯合報》，3 版。
- 陳曉慧（1998）。中國國民黨改造運動中對社會基礎的強化。《藝術學報》，63，209-229。

- 張瑞玲（1990）。《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臺北市。
- 袁瑜瑜（2003）。《國民黨文工會職能轉變之研究——1951 年至 2002 年》（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宜蘭縣。
- 夏士芬（2020）。《威權統治主義下的「台北市報業公會」（1949～1958）》（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 陳國祥、祝萍（1988）。《台灣報業演進四十年》，二版。臺北市：自立晚報社。
- 華聯社（1957 年 11 月 6 日）。新聞業廣告免稅案 立院昨日激辯。《聯合報》，3 版。
- 彭明輝（2001）。《中文報業王國的興起：王惕吾與聯合報系》，初版。臺北市：稻鄉。
- 楊秀菁（2002）。《台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臺北市。
- 蔡宗恆（2016）。軍閥先烈—徐搏九。檢自 <https://tw.news.yahoo.com/軍閥先烈-徐搏九-060500473.html> (Oct. 23, 2019)
- 聯合報（1952 年 2 月 27 日）。自由中國美展 昨日正式揭幕 各界籌備於青年節 舉辦今日台灣影展。《聯合報》，2 版。
- 聯合報（1952 年 8 月 15 日）。記者公會·報業公會 歡迎沈昌煥等 沈氏蕭自誠分別致詞 馬星野特撰聯語祝賀。《聯合報》，1 版。
- 聯合報（1952 年 8 月 22 日）。本市報業公會 昨歡送董顯光。《聯合報》，1 版。
- 聯合報（1952 年 12 月 23 日）。記者公會 今日開幕 請吳市長啓鑰。《聯合報》，3 版。
- 聯合報（1953 年 1 月 8 日）。報紙是有力量的！。《聯合報》，3 版。
- 聯合報（1953 年 4 月 16 日）。政府發言人沈昌煥 呼籲報人團結反共 並促策劃反攻準備工作。《聯合報》，2 版。
- 聯合報（1955 年 10 月 7 日）。台北報業公會昨決議 再籲立院規定豁免營利所得稅金。《聯合報》，1 版。
- 聯合報（1956 年 7 月 21 日）。新聞事業團體 請緩徵營業稅。《聯合報》，3 版。
- 聯合報（1956 年 12 月 22 日）。改善銀樓管制辦法 立法院決定重交付審查 廣告納稅案討論未畢。《聯合報》，1 版。
- 聯合報（1957 年 11 月 9 日）。自治捐防衛捐草案 立院決定交付審查 報業請修訂營業稅法未獲通過。《聯合報》，1 版。
- 聯合報（1959 年 2 月 2 日）。新聞業免稅綜談。《聯合報》，5 版。

註釋

- 註 1 中央社（1958 年 10 月 3 日）。失蹤記者生還無望 報業公會八日追悼。《聯合報》，3 版。「……，對前往金門前線採訪，不幸覆舟落海失蹤的六位中外記者，表示深切的悼念。……」。及蔡宗恆（2016）：「……民國 47 年 8 月 23 日爆發的 823 砲戰，中共向金門島群發起砲擊，震驚中外；砲戰期間，中外記者紛紛申請前往金門戰地，冒險採訪新聞，9 月 26 日，記者團搭乘的兩棲登陸車（LVT）在中共猛烈的砲火中，駛往金門料羅灣，卻在外海翻覆沉沒，造成 6 名記者罹難；……」，這六位中外記者分別是新生報徐搏九、中華日報吳旭、徵信新聞魏晉孚、攝影新聞傅資生，韓國時報崔秉宇、日本讀賣新聞安田延之。
- 註 2 聯合報（1956 年 7 月 30 日）。昨宴張彞鼎蔣堅忍。《聯合報》，3 版。及聯合報（1956 年 10 月 28 日）。新聞業代表 慰問謝仁釗。《聯合報》，2 版。「台灣省新聞同業業務促進會報，包括臺北市、報業公會、全省民營報紙聯誼會、新聞通訊事業協會、台灣省雜誌事業協會及中國廣播事業協會等五團體，日昨為立委謝仁釗被立委朱如松揮拳毆打事件，一致表示關切，特臨時集議，推派代表李漢儀、陸蔭初、汪宗魯、葛滋韜、胡炯心等前往謝委員公館特致慰問。……」
- 註 3 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依法登記之報社、雜誌社、通訊社、電視臺與廣播電臺銷售其本事業之報紙、出版品、通訊稿、廣告、節目播映及節目播出。但報社銷售之廣告及電視臺之廣告播映不包括在內。」
- 註 4 原文是：十、依法登記出版之報社、雜誌社、通訊社及廣播電臺；但其所收廣告費及販賣非本身出版品部分仍應征收營業稅。「所收廣告費及」字樣已從但書中刪除。
- 註 5 原文是：廣告費及銷售非本身出版之書報雜誌之價額。「廣告費及」字樣已從計征標的項目中刪除。